

吴先生仙逝周年祭

彭 华

(1959~)，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标本馆馆长，研究员。1992~1995年就读吴征镒院士博士研究生。

6月20日将至，吴征镒先生离开我们已经将近一年，但其音容笑貌宛在眼前。先生的一生，我们已经有很多不同视角的总结，此处只是以一个学生的身份，在多年耳濡目染的教诲中掬几朵学术和生活的浪花，以纪念敬爱的先生。

知道先生是相对久远的事了。1982年，我们在云南大学，临近毕业，跟孙必兴先生做云南狗尾草分类的毕业论文。作为高年级学生，孙先生曾带我们到昆明植物所标本馆看禾草标本。孙先生告诉我们这里有个大分类学家叫吴征镒，看孙先生如此，我们几个学生即刻有了高山仰止的感觉。依稀记得1980年底在云大上二年级参加朱彦丞先生的送别会时，吴先生曾经来过。只是到了后面读硕士，才得以直接聆听吴先生的教诲。1986年春夏之交，在贵阳贵州科学院后面的石油大楼，召开全国植物区系地理讲习班。吴先生给我们上课，讲植物区系地理，用的云南植物学会的油印本。我后面考博士就用的这个本子。在六冲关植物园实习时，吴先生一路介绍植物，一路的拉丁名，叫我们多么的佩服啊！至今仍记得见过的 *Aesculus chinensis*（当时正开花）、*Kalopanax septemlobus*（记得，我们家乡叫刺朽，也许发音不准啊，砍柴时很差的東西）、*Nandina domestica*（有花果）等等。

经过北医大生物教研室工作两年、硕士毕业回贵州科学院工作四年，1992年，我有幸考取吴先生的博士生。先生知道我的背景是植物分类（本科为云南狗尾草）和区系（硕士为早熟禾亚科植物区系），可能时值区系大课题期间，就指派我做滇中南无量山种子植物区系研究，也算是一个具体区系的研究吧，嘱咐我特别注意东西坡的差异和替代问题。我和雷立公一届，算起来是先生入籍的第四批博士生。前面有第一届的李建强、周浙昆、李德铤，第二届（似乎实际只差半年）的朱华、唐亚、杨亲二，不知道为什么中间空了好几届，1991年是孙航和丁仕友。后面不知道是名额的问题还是什么，先生就没有每年再招过2个以上的博士生了。至于谁是关门弟子，还真不好说，因为有进门和出师的时间差异。

现在每次上面来人视察标本馆，作为馆长，我都会带领大家来到二楼被子植物的第一个科——木兰科，打开一个位置适中的标本柜，每次呈现在我们眼前的均是先生的鉴定签。不知是无意，还是馆里刻意安排，总是让我感到很亲切。看着先生的手书，密密麻麻的熟悉小字（多半是特征集要式的简短文字），植物分类学的根本——拉丁学名，顿时令人肃然起敬。我们就会娓娓道来这段历史，先生甘坐冷板凳，为KUN（昆明植物研究所标本馆）鉴定了大量的标本，也使得很多“C. Y. Wu ex某某人”或者“C. Y. Wu et某某人”的发表格式成为现代中国植物分类学文献中的常景。往往参观的领导及随从们匆忙离去后，我仍会在思绪的海洋中畅游，仿佛回到西南联大时的艰苦岁月，寂静的标本馆中，以洋油箱横放代替标本柜的“标本室”内，一个戴深度眼镜的青年学人在标本堆中工作，一边是一些秦老周游列国带回的模式标本照片，一边是国内的标本，他在这两者间搭起了难能可贵的桥梁，再通过他那三万来张特殊的卡片（上面记有中文名、拉丁学名、主要文献、标本



记录和分布等信息），为国家的植物分类学基本的编目奠定了深厚基础。在日后的工作中，得益于这段厚积薄发的积累和钻研，吴先生逐步成长为享誉世界的植物分类学大师。

每当别人夸赞先生的“植物电脑”的精准时，我们会想到他这段甘于寂寞却十分传奇的经历。这份成就固然缘于他超乎常人的博闻强记能力，但是没有自身的艰辛努力，是不能达于成功的。世间任何事情做到极致，都会收获不一般的回报。想起1992~1995年我做博士论文的时候，就深深体会到先生工作的事半功倍。当时他在总结国家基金委的第一个重大项目“中国种子植物区系研究”，间歇调节，他就会隔三差五地叫我把在无量山采集的新标本中挑一些我暂时对付不了的下去跟他一起看。说是一起看，基本上是他讲拉丁，我记录，一般是鉴定到属，不少直接到了种，使我大开眼界，并如仰望泰山北斗般感知他深厚的功底。记不清是2500多号标本中（除禾草、兰科）的多少，我对付不了的大多通过这样的方式得以鉴定，对一个被做称为具体植物区系的山头工作是多大的帮助啊！在翻阅浩如烟海的云南标本查找无量山标本时，又看见了很多上面提到的吴先生的鉴定。同时听老先生们说吴先生的卡片保存在下面图书馆，就专门去看，如今这些工作近半体现在了1984年出版的《云南种子植物名录》中。知道这是一种很好的方法后，就用在了自己的无量山种子植物区系名录中，一种一卡，统计各个物种的海拔分布后，就热带、温带成分的属的分布提出了平衡点的概念和应用。卡片法，看似古老，但在分类学研究上非常适用，如果一张标本（特别是模式）一张卡片，不管怎样分堆，如何排列，最后都能很容易找到拉丁正名和异名。通过这个简单的扩展，使得自己在区系研究和经典分类上都变得轻松。尽管进入了电脑时代，我自己的卡片亦仍用橡皮圈一科一捆置于办公室卡片盒中，时不时在学生面前显摆一下，传承吴先生的故事。饮水思源，非常感谢先生的卡片示范。今天，吴征镒办公室在数字化处理这批卡片，但愿它们能发挥更多的用处，这份卡片作为时代的印记将永远彰显先生的精神和毅力。

1995年春毕业留所后，作为先生的学术秘书，主要协助他完成区系大课题的总结和结题。后面就是《中国植物志》第一卷（我们四个弟子各负责一个任务）和《云南植物志》后续任务及蓬勃启动后不断发行中的《Flora of China》。当然还有大量给先生拟定各种文件。在区系大课题结题中和吴先生80华诞国际学术会议上，负责给先生制作投影薄膜（当时还没有PPT）和放映。记得在审议前面各卷《Flora of China》的proof的时候，先生均一字一句的认真审读，并写出审稿意见，由于他的手写体我和小杨认识多一些，但由于有大量的拉丁名，均由我亲自输入后经他认可发往密苏里。有个卷本先生写了很认真的意见，外方联合主编Peter H. Raven教授在传来的邮件中非常感佩。

可能是固有的大家风范，在我毕业后跟随吴先生的三年半时间中，很少听他说起自己过去的努力和奋斗。不像我们自己现在稍不注意会在学生面前故作玄虚地讲起不太久远的采集和鉴定，高下立现。带学生去见先生，说起在做苍山的种子植物区系时，他会提醒要去北京大学看他当年在那里采集的标本。当然，他不会不知道，现在要去看这批藏于北大的老标本有多难！先生健在且尚能看标本的时候，我们在野外不管采集了什么，心里非常踏实，因为实在弄不出来，那里有最后一道防



1996年12月3日，与先生在华南植物所留影

线。到后来，叫小杨偶尔转拿东西来看的时候，就知道先生视力已大不如前，反倒转来叫我给个名字。

1996年底陪先生去华南植物所，赵南先处长和夏念和先生负责接待，后者后来还成为了先生的弟子。在他给陈焕镛先生铜像揭幕并参加植物园建园70周年活动后，我们当即去了仙湖植物园。在陈谭清主任陪同看水生植物馆时，先生提到，植物园园艺和分类要发展，需要培养干部啊。好像他给仙湖园的建园15周年的题词中就写有“培养干部”的内容。可见植物分类和植物园艺均是需长期培养和坚持的学问。所以，当下一些远见卓识的学问家们提出要坚持对植物经典分类进行差别考核是十分重要的。作为一门积累性基座性学科，没有一定的积淀是不可能拔地而起的。在植物园安排我俩休憩贝岭居时，先生意兴高涨，畅述胸怀，使我知道了科举制度的前三甲（状元、榜眼和探花）是由第四名传胪宣布，因为先生的爷爷就是那年恩科的传胪。可能是见了很多故旧高兴的缘故，他还说起了很多很多，我记得清楚的是西南联大时，他一天两包哈德门，开销往往捉襟见肘。可见在晦暗庞杂的标本间工作需要多大的定力啊！没有刻骨铭心的喜爱，要坚持近十年有多不易啊！只有个大学毕业论文的“河北藁草”和来云南后的“瑞丽森林植物及区系”的阶段产出，放在今日，早出局了，何来70多年后的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1998年是陪先生外出较多的一年，4月陪先生去了桂林，我是第一次到访桂林的广西植物所。院里开生物分类区系专项评审会，吴先生是顾问。专门陪同的有文和群副所长，很好的一个专业人士和领导，近闻噩耗，很是悲痛！在机场到雁山的路上，记得路过一个良丰农场，先生马上就说张宏达先生的一个海桐新种的模式就产于此地。当时就那么一点钱，但是会议规格很高。见到了北京所路安民、微生物所魏江春、华南所吴德邻、沈阳林土所的曹同（现上海师大）和我所的陈书坤等诸先生。会议暇余，去看望了梁畴芬先生，记得梁先生住的是一个那时很看重的独栋，就在所里面的一个小院子里。那次还考察了漓江沿线，特别是在叠彩山过了一个山洞的时候，洞口全是各种文人侠士的题词，先生指着路边一个花果具备、果实两瓣裂开、果片内侧有横格的灌木告诉我们，这就是前面说的模式产良丰的扁片海桐。可见什么叫专业精神和植物电脑！如果把全中国的种子植物



陪先生去仙湖植物园
 （右起：张明理、彭华、孙航、李德铎、段金玉、吴征镒、李建强、朱华、王印政、杨亲二、吴鹏程）



都出神入化到这种地步，作为国家战略资源的植物种类和分布状况就会越来越清晰和可靠。记得先生说广西石灰岩地区特有程度高，还说出了很多当地的特征成分。下船后到阳朔城南到了刘三姐丢绣球的大榕树下，先生拉丁学名张口就来“*Ficus microcarpa*”。我们知道这是如今昆明乃至我所也多有种植的小叶榕，该树种近年因气候周期原因而成色不佳。1998年底，与大家一起陪同先生和师母去深圳参加了全国的植物学大会，先生的诸多弟子参加了这次会议。仙湖植物园积极主办的这次会议，深圳也很重视，成为我记忆中大师云集的一次会议。到2003年成都会议，先生年事已高，就没再出席了。

缘分，缘于为命运纠缠的丝线，是中国文化的一个抽象概念，是一种人与人之间无形的连结。1999年1月我去日本京都大学Tobe实验室做访问学者后，暂时离开了先生，联系也相对少了。但是临近年底结束时，获知先生荣获“COSMOS”国际大奖，令人兴奋。通过积极争取，我得到了一个参加日本政府在大阪授奖仪式的名额，由于是先生弟子的缘故，座位是很靠前的第二排。日本小渊惠三总理来了贺词（一个大臣宣读），并有皇太子夫妇和两个国务大臣出席。目睹了先生的整个荣誉过程，心里很激动！后面先生和师母又来到我在的京都参观植物园，我和同在京都大学的昆明动物所刘万兆博士轮流推着先生的轮椅全程陪同，他依然是电脑般的精准，园子里的日本植物几乎没有不认识的。同时，还与他一起去看望了他的好友，日本著名植物分类学家北村四郎（Siro Kitamura）教授。

日本受奖回来后，以为“COSMOS”国际奖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奖项。在科学院安排下，与单位和同门中人一起为先生申报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其中一次申报印象特别深刻，先生亲往，李德铎代答辩，我放映PPT，所长郝小江等陪同，规模很大。答辩会后，在离院部不远的一家淮扬菜名店，先生约请北京植物所洪德元院士共进晚餐，我们四个弟子（德铎、孙航、浙昆和我）作陪，席间先生谈及望洪院士多关注《Flora of China》编纂事务。特别声明，当时付账我用的是先生自己的钱包，没有报销。2003年还陪先生和师母去北京钓鱼台领取何梁何利个人成就奖，在贵宾室休息时，见到了同时获该奖项的邹承鲁先生。规格很高，国务委员陈至立亲临颁发。会后还和另来北京开会的杨永平一起去了先生的五哥家，见到了德高望重、高寿且生活顽强的吴征镒院士。



1999年先生获COSMOS国际奖，授奖仪式后陪同先生参观京都植物园

后面先生在2006年以90高龄负责主编《中华大典·生物学典》，开启了学术生命上新的征程。翌年，先生以91高龄荣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终获实至名归的认可。获奖前的十多年，数百万字的《中国被子植物科属综论》《中国植物志第一卷》《种子植物分布区类型及其起源和分化》和《中国种子植物区系地理》等书稿完成，正如周浙昆兄所言，是由先生一笔一画写就，其时先生目疾已久，医嘱为生活留目力不可过度用眼，而先生不以为意，终日伏案笔耕，终有兀兀穷年，呕心沥血的经心之作。吴先生在完成所有文字后，提出了一个分工意见，我负责协助他《中国植物志》第一卷的统稿并挑选、整理其中被子植物区系地理部分需要的分布资料。但是后来一时间风传文稿

重复的疑问，实际上几人在大的框架内文段各有侧重，完全不重复是做不到的。

去年6月20日，先生走了，心中涌起无限的悲痛。后来，在龙凤公墓弟子们参与了师母全家为先生下葬的祭奠。

先生对国家、对事业、对学生一直怀有深厚的感情，人们永远记得他。去年底先生被评为“十大杰出云南人”，世人已经给出了答案。一个长年客居云南，将自己的灵魂化成漫山遍野享誉世界的草木的崇高学者得到老百姓的认可和怀念充分说明：一个伟大的科学家是依靠自己做出的事情，依靠自己的人格，在人民心中凝结成丰碑。

在这座丰碑前，我谨掬心香一瓣，敬奉给先生的英灵。这样的纪念，也是我们这一代人诚挚地从深深的心底里发出的。希望先生在天国有昆曲、邮集、海贝以及您命名的无数花木相伴而长乐未央。我要敬祷恩师，中国的植物学者在无数年后，亦会默默地祭奠您，为您献上心中圣洁的祝福。您的精神和对植物的热爱，将永远薪火相传，激励后进，为我们所发扬而永存。

